

CHUANTONGREN LUNYU
ZHUANXINGQIXIANGCUN
JICENGZHENGZHUYUNZUO
孔德永◎著

传统人伦关系与

转型期乡村基层政治运作

——以南镇为中心的考察



CHUANTONGREN LUNYU
ZHUANXINGQIXIANGCUN
JICENGZHENGZHUYUNZUO
孔德永◎著

传统人伦关系与

转型期乡村基层政治运作

——以南镇为中心的考察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传统人伦关系与转型期乡村基层政治运作：以南镇为中心的
考察 / 孔德永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3

ISBN 978 - 7 - 5004 - 9305 - 1

I. ①传… II. ①孔… III. ①农村 - 群众自治 - 研究 -
中国 IV. ①D63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24764 号

策划编辑 冯春风

责任校对 周 昊

封面设计 回归线视觉传达

技术编辑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6.75

插 页 2

字 数 298 千字

定 价 35.00 元

序

德永君于2007年入复旦大学，在我的指导下做博士后研究工作。在博士后工作期间，他先后主持了两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和一项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发表了一些相关成果，还获得了一些省部级的成果奖励。2009年出站之后，又主持承担了一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经过几年的沉淀与思考，修改后的博士后出站报告终于要出版了，这是一件很令我高兴的事。

乡村治理是多少年来一直是国内外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国也已趋成为一门“显学”，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已经比较多。然而，读了德永君的《传统人伦关系与转型期乡村基层政治运作——以南镇为中心的考察》之后，仍有耳目一新的感觉。作者切入了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道德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为主线，展开了他的研究。人类政治生活始终受到一定的价值取向的支配和制约，政治的价值问题首先涉及的就是政治的道德基础问题。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曾经认为，政治问题本质上就是道德问题，他说你要将政治问题与道德问题分开，那么你既不能理解政治，也不能理解道德。政治的目的不仅仅在于维持人类的道德秩序，更重要的是要促进人类道德秩序的发展，努力建构良好的社会人伦关系，社会政治秩序的确立必须以道德秩序为基础。以往的人类制度设计，要么从人的精神存在或客观化了的精神存在出发，要么从人的物质存在以及基于物质存在的要求出发，因此，结果出现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的两难选择。人是社会人，人的道德存在才是人的社会性本质所在。道德与政治之间、文化与权力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基层政权是我国政治系统的战略性的基础构造，在维护社会稳定和改善社会治理等方面均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基层政权建设更是关乎党的执政与国家建设的重大战略领域。乡村基层政权与农民的日常生活更为息息相关，乡村社会联系国家的唯一组织化渠道是基层政权，基层政权是国家政权的重要基石，乡村中国各种问题和危机发生，归根到底来自乡村

组织的困境。而实现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一直是历朝统治者努力探索和梦寐以求的政治目标，而农村问题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总想解决而没能解决的问题。政治运作需要依靠一定的道德资源作为补充，权力运行离不开文化网络的支撑，制度是建立在人性基础上的，权力只有建立在情理法的基础上，权力才可以稳定地运作下去。一个社会的秩序来源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交互作用，这在传统中国乡村社会表现得更为明显。传统中国社会在政治权力的实际运作中，人伦关系同样发挥着巨大作用。我国乡村社会的政治运作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层制运作，更大程度上为乡村非正式制度和地方性知识所支配，乡下锣鼓乡下敲。

本书以转型时期的乡村社会的道德与权力的关系为研究对象，运用实证方法研究人伦关系等非正式制度与转型时期乡村基层政治运作之间的博弈关系。在作者的论述中，涉及到文化与权力之间的互动关系，传统与现代性的关系，也涉及到转型时期乡村社会政治运作的逻辑以及未来走向，并力图寻找摆脱我国目前乡村治理困境的对策。在社会转型时期，中国乡村人际关系的价值取向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利益关系在更大程度上取代人伦关系成为人际交往的主导性原则，决定人际关系网络的不再是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和“礼治秩序”，而是人们因社会活动交织在一起的利益关系。随着人民公社体制的瓦解，乡村里的正式组织逐渐丧失了凝聚力和权威性，2006年前后，乡村农业税被逐步取消，乡镇与村的共同体利益也逐渐被淡化，这样，传统人伦关系等非正式制度重新产生了社会文化价值，并开始对乡村基层政治运作产生更为直接的影响。目前，在某种程度上说，我国农村正在发生着治理性危机，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断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联系，强制性权力和压力型体制左右着乡村政治运作，工具理性远远超越于价值理性之上，忽视了人们之间的人伦亲情对政治运作的粘和促进作用，国内学者对人伦关系的作用的认识也往往关注其负面作用。作者在本书中提出了一个以“中国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情感共同体”为核心的理论框架，用以分析和解释中国乡村未来治理与发展的方向、动力和机制问题，更试图以人伦为概念为基础分析转型时期乡村治理的问题与出路，对于国内学术界来说，它是一个很大的理论和实践难题，对于作者本人来说，也是一个宏大的学术愿望。

本书在对国内外关于人伦关系与乡村政治运作的研究现状梳理的基础上，首先对人伦、权力、关系等基本概念进行了界定，运用了人性假设理

论、社会交换理论和理性选择理论等分析工具。通过对南镇个案的实证剖析,分析传统人伦关系与乡村政治权力运作主体的产生之间的关系,并以税费征收、计划生育和社会稳定等具体事件和情形为切入点,分析了农业税时代和后农业税时代乡村政治运作的方式和逻辑,这种逻辑呈现出从政治化运作向关系运作、从刚性运作和科层制运作向柔性运作和乡土性转变的趋势和特点。在本书的最后,作者对乡村政治运作的历史逻辑进行了概括。传统中国乡村社会是崇德重法,伦理政治化,比较重视传统人伦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公社时期社会的政治组织网络联系代替了传统的人伦亲情关系,政治理想主义和阶级关系挤占了传统人伦的生存空间。社会转型时期,尤其是后农业税时代,这一阶段又过分地突出了精英政治,特别重视能人治村,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人伦纲常的存在,乡村政治运作又走向了另一极端。在某种程度上,使得我国乡村社会出现了人伦亲情泯灭和人与人关系高度紧张的状况,乡村政治运作也陷入了混乱的困境。在本书的结语中,作者对我国乡村政治运作的未来走向提出了自己的几点想法,这些想法都是非常具有启迪意义的。

当然,本书所涉及之问题,既是一个老问题,又是在新的情势下的新问题。作者的很多观点和想法,似乎还仅仅是个初步的探讨,无论是在观点上还是提法上,都还有一些尚待完善之处。书中的思考和认识,只能说是作者的一家之言,在一些方面也难免会有缺陷和不足。传统人伦关系与基层政治问题的研究涉及到伦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因此在理论视野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拓宽。同时,在实证研究的方法上还需要更加的精细和深入。但是无论如何,作者的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已经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是为序。

桑玉成

2010年9月2日

目 录

序	(1)
导论	(1)
一 研究的缘由	(1)
二 调查地点的选择	(7)
三 研究现状	(12)
四 研究意义	(35)
五 研究视角、方法与分析框架	(39)
第一章 概念阐释与相关理论	(50)
一 基本概念	(50)
二 相关理论	(66)
小结	(73)
第二章 南镇概况	(75)
一 南镇的地理和历史	(75)
二 南镇的人伦关系	(81)
小结	(87)
第三章 传统人伦关系与基层政治运作主体的产生	(89)
一 人伦关系与村官的产生	(89)
二 人伦关系与乡官的产生	(109)
小结	(115)
第四章 传统人伦关系与乡村基层政治运作的方式与逻辑	(117)
一 税费时代的基层政治运作	(118)
二 后农业税时代的基层政治运作	(134)
小结	(164)

结论与讨论 乡村政治运作的历史逻辑与未来走向	(167)
一 乡村政治运作的历史逻辑	(168)
二 乡村政治运作的未来走向	(172)
附 录	(198)
参考文献	(242)
后 记	(257)

导 论

一 研究的缘由

法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认为,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职责在于对社会运作进行科学分析。同样的道理,政治学者的职责就在于对社会政治运作进行科学分析。政治就是人们围绕公共权力而展开的活动以及政府运用公共权力而进行的资源的权威性分配的过程,“政治的本质是权力”。^① 英国著名学者安德鲁·甘布尔曾把政治概念分解成三个维度,“由作为权力的政治、作为身份的政治以及作为秩序的政治三个纬度所构成的政治王国仍然是人类经验以及人类能力的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权力是政治中的一个工具性纬度,它所提出的问题是得到了什么、何时得到和怎样得到”。^② 在政治学研究中,政治权力既是个基本概念,也是一个核心议题。对此,美国政治学者罗伯特·达尔认为:“权力概念是政治分析的中心。”^③ 这正如美国学者诺顿·朗所说:“行政管理的生命线就是权力,权力的获得保持、增长、削弱和丧失是实际工作者和研究者不能忽视并承受不了这种后果的问题。”^④ 在法国著名思想家米歇尔·福柯看来,对于任何一种权力的考察,应当在微观层面,应当在权力运作的末梢,在一种权力与另一种权力交界的地方;只有在这里,我们才能真正了解权力是如何实现的。^⑤ 福柯认为,权力是多形态的,既有国家机器自上而下的运作,也有自下而上的微观权力,而且在现代社会中,微观权力运作成为权力运作的主要形式。而“研究稳定的政治体系(无论是民主的还是权威主义的),往往从作为其

① [美] 安东尼·奥罗姆:《政治社会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

② [英] 安德鲁·甘布尔:《政治和命运》,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7页。

③ [美] 罗伯特·A. 达尔:《现代政治分析》,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1页。

④ 彭和平等编译:《国外公共行政理论精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第67页。

⑤ 苏力:《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6页。

政治基础的机制构架入手”。^① 因此，要分析权力就要从其细节开始，从各种细微的实践着手，对权力分析要特别注意权力的微观机制和考察各种微观权力。政治现象最核心的问题是权力及其运行。权力实现是通过政治基础的机制构架来完成的，而这种构架即是权力的运作。徐勇教授认为：“对于日常生活中的个人来说，政治十分遥远，又近在咫尺。说它遥远，是因为它好像潜藏在制度文本里，说它很近，则在于它体现在生动具体的日常生活中。只有当政治运作时，我们才会真切地感受、发现和认识政治的实然状态。”^② 所谓政治运作即政治权力的运作，它是指政治主体依据政治制度、政治目标、政治程序的基本要求，行使政治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政治活动。^③ 上海大学社会学金桥博士在《基层权力运作的逻辑——上海社区实地研究》中把权力运作的内容概括为资源作用的发挥、某种策略的选择和对不确定领域的掌控等。政治运作可以理解为政治权力实施的过程和机制，它是指政治权力主体行使政治权力的过程，是行动者之间的互动过程。政治权力运行要素一般包括四个方面：权力运行方向、权力运行目的、权力运行方式和权力运行逻辑。政治权力运行是指政治权力主体行使政治权力的过程。换句话说就是政治权力主体对政治权力客体施加支配或制约作用的过程，是政治权力主体的意志和行为的体现。恩格斯指出：“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符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④ 吴毅教授认为：“评价一个制度及其效应，不能单看它是如何书写，更重要的是要看它如何运作，以及这种运作可能产生什么效果。一个制度所能够体现出来的真实关系和属性，只有在动态的和运行的过程中才能够得到最权威的验定。”^⑤ 文本政治与事实政治之间存在着差距，甚至可能是南辕北辙的。基层政权的权力，不仅体现为静态的制度文本，更重要的是体现为具体的动态过程。权力运作实际上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它是权力主体与权力客体博弈互动的过程，公众是权力的主

① [美] 詹姆斯·R. 汤森布兰特利·沃马克：《中国政治》，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1页。

② 樊红敏：《县域政治权力实践与日常秩序：河南省南河市的体验观察与阐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序二第6页。

③ 杨明伟：《政治运作问题初探》，《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08年第6期，第60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4页。

⑤ 吴毅：《记述村庄的政治》，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86页。

体，是政府的委托人，政府是公众实现其利益与满足其需要的手段或工具，是公众的代理机构。凡是有团体的地方，就会有权力关系的存在，这种关系到底是怎么产生的？为何运作？如何运作？为何如此运作？运作方式是什么？运作逻辑有哪些？是有效运作还是低效运作等问题。因此，关于权力结构问题，研究的关键不是权力到底属于谁的问题，而是权力结构的形成过程即权力的发生、运作等问题。我们要把权力这种分析工具尽量地化约为生活或行为方式的一部分，即关注日常生活中的权力变迁或权力运行规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厘清制度的实践逻辑是如何解构和重构制度文本逻辑的。这是因为“权力关系格局并不仅仅是一个结构概念和制度概念，地方势力间互动的历史实态与正式制度、意识形态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前者比后者要复杂得多”。^① 在对政治运作的研究中，一般说来，县以上的政治运作同质性比较强，而县以下乡村社会的异质性对研究政治运作更具有代表性，更能体现出政治运作的艺术性与复杂性。“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这是对基层工作的重要性 and 难度的真实写照。在我国现有的行政层级中，乡镇政权是最基层的一级，乡镇政权是政治体系中连接国家机器和公民生活的中介，其本身具备国家政权的各个特征和职能，它面对的却是一个复杂多变的乡土社会，简单地从国家政权下沉等理论角度理解乡镇政治未免有失偏颇，“乡域政治无疑更能体现出乡村基层政治在体制与非体制、结构与非结构以及制度与文化的贯通方面所呈现出来的时空统一性和完整性”。^② “权力应当作为流动的东西，或作为只在链条上才能运转的东西加以分析。权力从未确定位置，它从不在某些人手中，从不像财产或财富那样被据为己有。权力运转着。权力以网络的形式运作，在这个网上，个人不仅在流动，而且他们总是既处于服从的地位又同时运用权力”。^③ 因此，我们只有从微观权力运作角度切入，从权力运作的非制度化视角，对地方基层政策具体实行过程中权力运作的关键环节进行细致入微地考察，以揭示微观权力与宏观权力的运作路径以及乡村社会治理结构与秩序的生成过程，可能更有益于我们对转型期乡村基层政治运作图像的透视与描绘。

社会与政治，无不从人伦开始，因此，认识人伦是认识人类社会的基

① 李世众：《晚清士绅与地方政治——以温州为中心的考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3页。

② 吴毅：《小镇喧嚣——一个乡镇政治运作的演绎与阐释》，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601—602页。

③ [法] 米歇尔·福柯：《必须保卫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28页。

础。杨懋春在《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一书中认为，研究中国的乡村，必须把乡村生活放在一系列社会关系里进行，特别是家庭关系和村落关系，这是中国乡村研究不容忽视的两个视角。^①而传统人伦关系则构成了家庭关系的主要内容。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曾经说过，人类家庭是一个伦理的实体。德国哲学家康德指出：“有两样东西，我们愈经常愈持久地加以思索，它们就愈使心灵充满始终新鲜不断增长的景仰和敬畏：在我之上的星空和居我心中的道德法则。”^②这里所说的心中的道德法制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传统的纲常关系，也就是人伦的基本规范。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认为，政治问题本质上就是道德问题，他说你要将政治问题与道德问题分开，那么你既不能理解政治，也不能理解道德。^③而传统人伦关系就是一种人们之间相互的道德关系，而道德问题从本质上说也是一个政治问题。这正如恩格斯所说：“父亲、子女、兄弟、姊妹等称呼，并不是单纯的荣誉称号，而是代表着完全确定的、异常郑重的相互义务，这些义务的总和构成这些民族的社会制度的实质部分。”^④传统人伦关系左右着政治运作，同时，政治运作也在改变着传统人伦关系。政治运作的主体是人，行使权力与感受权力的主体是人。人是一种有着复杂情感的社会性动物，马克思指出，人不只是个体感性的存在，而且还是类的存在和社会的存在。“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⑤支撑人内在灵魂的就是文化，而文化主要是指人的精神生活。作为社会中的人并不仅仅为了面包而活着，人的行为最明显特征是人表现了极其强烈的情感和追求。无论是什么政治体制，无论制定的是什么法，执行的总是人，人的活动也都是围绕着人和人的交流展开的，而人和人的接触不可能不带感情的，有了人就有了“伦”，这是没有办法被人舍弃的，有了伦就有了一些固定的规则——人伦。

社会的秩序来源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交互作用，传统中国乡村社会表现得更为明显。非正式制度是指人们在长期交往中无意识形成的规则，主要包括价值理念、乡规民约、道德观念、习俗惯例等方面。“天时不如地利，地

① 杨懋春：《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22—242页。

② [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77页。

③ 桑玉成：《政治价值观与政治生活的改善》，人民网，2005-11-14。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页。

⑤ 同上书，第1卷，第56页。

利不如人和”，“人和”即人际关系的和谐。乡村社会的运作，更多的时候为这种非正式制度所支配。“在曾经被国家权力广泛深入的乡村社会，非正式的治理实践不同于正式的治理实践，它无法制度化，却嵌入于乡村的日常生活中，有其存在的合理性”。^① 贺雪峰在《私人生活与乡村治理研究的深化》中指出，在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中，不仅有正式的公开的制度和关系作为基础，而且还有隐蔽的非正式的灰色基础。现行的研究理论更多地着眼于对正式制度的形式化研究，而忽视了人伦等文化因素对组织化的互动作用。吉登斯过多地强调现代性对传统取代的有效性，而忽视了乡土传统的持续性和顽固性。在政治权力运作过程中，传统人伦关系发挥着巨大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它构成了一种和国家正式权力相抗衡的非正式权力。在中国这种关系取向的社会里，个人所拥有的社会关系是一种重要的权力。“传统是社会所累积的经验……在乡土社会中，传统的重要性比现代社会更甚，那是因为在乡土社会里传统的效力更大”。^② 孟德拉斯认为，传统农民不会怀疑“传统”，而是将“传统”视为理所当然的“生活和工作必须遵循的正常方式”。^③ 传统中国的农民，生活在由血缘和地缘交织而成的关系网络中。其中，最重要的血缘组织是宗族，而最重要的地缘组织是村庄，两者之间的关系呈现出十分复杂的形态。从中国的政治传统看，“政权和财富通过血缘家族联系起来，这可以说是中国社会面貌最重要的特征之一”。^④ 在现代社会，国家只有与社会实现有效衔接和有机互动，才能实现良好的治理。现代权力内在于现代社会关系的再生产链条之中，国家权力的目的不仅仅在于维持简单的延续，而且力图在具体运作过程中实现自身的再生产与再扩充。乡村基层权力只有建立在情理法的基础上，只有与乡村地方性知识相结合，才可以稳定地运作下去。

“大传统”和“小传统”的概念是美国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在其发表的《乡民社会与文化》一书中提出的。所谓大传统一般是指一个社会里上层的贵族、士绅、知识分子所代表的主流文化或者社会中的上层精英文化，而所谓的小传统是指一般社会大众，特别是乡民或俗民所代表的生活文化，而小传统则是以农民为主体，基本上是通过口传的生活实践在农村中传衍的，具有地域性特征，小传统代表的是民间的非正式制度，小传统的概念对中国的

① 吕德文：《简约治理与隐蔽的乡村治理》，《社会科学论坛》2010年第8期。

②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中国》，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41—42页。

③ [法] 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7页。

④ [美] 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32页。

乡村社会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传统的人伦关系属于乡村社会的小传统，这种小传统已经深深积淀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成为人们思想与行为的基本心理法则。中国的传统社会，国家对社会的控制是通过“礼”来达成的，而社会本身也是通过“礼”来维持的，因此，传统中国乡村是一个以非正式制度为主的社会。“国家的运行机制除自身的一套逻辑外，在民间社会也有一套自行的逻辑，这一逻辑并不是孤立的，它本身的一些社会实际又能对国家的运行起到推动作用。因此，国家与社会、大传统和小传统的关系，并非仅仅为由上到下，由大到小的问题；有时也是一种由下贯上，由小到大的‘折射’关系，这一视角置于对中国文化和社会的研究中，无疑是有一定意义的”。^① 德国著名的现象学家马克斯·舍勒认为，生活世界的现代性不能仅从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来把握和规定，也必须通过人的体验结构来把握和规定。^② 因此，只有全面了解中国社会已经深深积淀在人们生活中的心性结构，才可能准确地把握乡村政治运作的大致走向，而传统人伦关系就是中国人心性结构。

在研究传统人伦关系与乡村基层政治运作问题上，从时间跨度上，笔者选择了社会转型作为研究的期限。“所谓社会转型，是指一种整体性的社会发展状态、全面的社会结构状态的过渡，其具体内容是结构转换、机制转换、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③ 社会转型是指一个社会结构变迁的过程，这种变迁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是从同质的单一性社会向异质的多样性社会转型，是社会世俗化的过程，也是一个现代性与传统相互交融的过程。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时期，从社会学角度剖析，是从“熟人社会”转向“陌生人社会”，这种转变过程也是相当漫长的，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是指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我国目前正处于转型的过程中。中国传统的人伦关系，是指长幼尊卑之间的关系，其主要内容是“三纲五常”，传统人伦关系的基础是血缘、家族和亲情。目前，随着社会的变迁，对于我国乡村治理而言，经过百年国家政权建设之后，中国乡村人际关系的价值取向上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人伦关系呈现出多元化和功利化等新特点，传统以“血缘关系”、“地缘关系”维系的“差序格局”

① 周大鸣：《当代华南的宗族与社会》，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1—32页。

② [德] 马克斯·舍勒：《资本主义的未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版，第6页。

③ 陈义平：《政治人：模铸与发展——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公民政治分析》，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8页。

已经发生了深刻地变化，利益逐渐成为“差序格局”中决定人们关系亲疏的一个重要维度，利益在更大程度上取代人伦成为人际交往的主导性原则，决定人际关系网络的不再是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和礼治秩序，而是人们因社会活动交织在一起的利益关系，这就使得社会资本严重匮乏，乡村社会呈现出了高度“原子化”的状态，乡村治理也一度出现困境。现代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传统的消失，传统因素在现代社会中仍然起着重要作用，传统人伦关系对乡村治理的作用更为明显。笔者力图通过该问题的研究，目的就是要尽力去展现这一复杂的过程，全面考察与探究社会转型时期中国乡村政治基层政治运作的逻辑和可能路径。笔者的主要理论关怀是探讨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传统人伦关系以及转化形式如何影响乡村基层政治运转的。

二 调查地点的选择

在研究传统人伦关系与乡村基层政治运作的问题上，从空间跨度上，笔者选择了传统人伦关系中具有某种典型意义的地域作为研究对象。根据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方法，研究者只有真正进入“他者的世界”，通过理解的方法，将“解释性说明”和“说明性地解释”结合起来，才能达到对“行动的主观上意指的意义”及其背后人们信念和价值观的理解。^①要研究乡村基层政治运作的真实状态，我们必须回到村庄和乡镇这一具体而真实的空间。这是因为“人们研究一个组织的运行，而无须将环境之中所有的行动者都包括在内，以同样的方式来对一个行动者的体系进行分析也是可能的。这些行动者一起对问题的确定抑或对问题的解决产生着作用；在某种程度上，这些行动者被他们具体的行动环境人为地分离开来，因为有关这些行动者诸种互动模式的观察向人们表明，他们彼此之间相互依赖”^②。以往人类学对乡村社会的研究，一般将田野工作范围限定在一个村庄。费孝通先生在进行江村调查的时候说过，研究人员出于实际的考虑，应该把自己的调查限定在一个小的社会单位来进行，但是这个社会单位不宜太小，应能提供人们社会生活较

① [德] 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11页。

② [法] 埃哈尔·费埃德伯格：《权力与规则——组织行动的动力》，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99页。

完整的切片。就一个农民的日常生活领域而言，真正对他有意义的，是其所置身的一个特定的村庄权力，而这种政治权力在自我表达与实际运作之间，总存在一定的差距。这是因为乡村并不像文本描绘的那样，而是有自己一套生存逻辑，这套生存逻辑和他们的生命感受融为一体，共同塑造了乡土社会自身的品格。除了上述理论背景以外，至于选择曲阜市南镇作为重点考察点，主要出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曲阜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

中国不同地域的文化系统虽然有很大差异，但是，在研究中国基层政治运作中的人伦问题，选择具有典型意义的某一地区作为研究对象，将使研究更具有可行性和操作性。儒家思想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儒家入伦观念对中国人的思想行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已经远远超越了南北地域界限。儒家不同于道、释，儒家入世而注重世俗人情。曲阜是中国人伦文化的发祥地，曲阜素有“孔孟之乡、礼仪之邦”的美名，尊孝道、重人情已成为曲阜市地方性文化的显著特征。虽然在社会转型时期传统人伦关系的作用与影响不如传统社会那么明显，但是，传统人伦关系并没有完全消失，仍然在乡村政治运作中发挥着作用，传统人伦关系在现代社会中也演变出了新的形式，乡村生活习俗中包含了丰富的政治内涵。在曲阜这块土地上蕴藏着丰富的传统人伦资源，传统人伦关系仍然左右着人们的思考，已经成为这里的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根据地域特色选取了山东省曲阜市南镇为“碎片”，也是源自这一作为中国传统人伦关系问题研究的典型个案所具备的学术价值，通过“解剖麻雀”，对乡村基层政治运作的实态从人伦关系的视角进行解读，从而探究传统人伦关系与乡村基层政治运作之间的博弈关系。

第二，曲阜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实行农业税的地方。

农业税是研究与观察我国乡村基层政治运作变化的一个重要节点，以2006年为时间点，可以划分为农业税时代与后农业税时代，税费改革前后乡村政治运作的方式与逻辑有很大不同。从历史上分析，曲阜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开征农业税的地区，早在春秋时期，鲁国在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实行的按亩征税的田赋制度——初税亩即履亩而税，按田亩征税，不分公田、私田，凡占有土地者均按土地面积纳税，税率为产量的10%，从此开始了中国农民缴纳农业税的历史。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依照有关规定，在广大农村地区征收农业税。从1958年6月3日通过的农业税条例，从1983年开始，除农业税外，国务院还根据农业税条例的规定，决定开征农林特产农业

税，1994年改为农业特产农业税；牧区省份则根据授权开征牧业税。农业税条例的施行，对于贯彻国家的农村政策，正确处理国家与农民的分配关系，发展农业生产，保证国家掌握必要的粮源，保证基层政权运转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作出了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的决定，这标志着在我国延续了2600年的农业税从此退出历史舞台。

第三，给历史与现实的一个回应。

本书选取的个案镇因为位于曲阜市的南面，依据社会人类学匿名的规则，笔者把它命名为南镇，按照学术惯例，本研究中的所有的人名地名都进行了技术处理，南镇仅仅是一个学术研究的符号。曲阜市的陈家庄是毛泽东主席曾经批示过的村庄，新中国成立后，该村在全国率先走上了互助合作化道路。1952年10月2日，正式成立陈家庄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全县第一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5年年底，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了一本书，叫做《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并且为许多文章加了按语。其中，来自山东曲阜一个农村的报告，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这个报告介绍了孔夫子家乡组织农业合作社并取得快速发展的情况。毛泽东提笔为这份报告写下了这样的按语：“曲阜县是孔夫子的故乡，他老人家在这里办过多少年学校，教出了许多有才干的学生，这件事是很出名的。可是他不大注意人民的经济生活。他的学生樊迟问起他如何从事农业的话，他不但推开不理，还在背后骂樊迟做‘小人’。现在他的故乡的人民办起社会主义的合作社来了。经过两千多年仍然是那样贫困的人民，办了三年合作社，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都开始改变了面貌。这就证明，现在的社会主义确实是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比起孔夫子的‘经书’来，不知道要好过多少倍。有兴趣去看孔庙孔林的人们，我劝他们不妨顺道看看这个合作社。”^①毛泽东在按语中提到的“这个合作社”，就是山东省曲阜县陈家庄农业生产合作社。毛泽东当年所关注的曲阜农村基层政权，今天发展状况如何？通过笔者研究可以有一个历史与现实的互应。

第四，与自己的学习生活和学术背景相关。

政治过程是一个“黑箱”，任何学者作为局外人是无法弄清其如何运作的。在乡村做长期深入的访谈调查，没有熟悉的亲友关系，是十分困难的。光凭一纸介绍信和上级政府的批示，并不能使调查者与村民之间建立起亲切的信任

^①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54—455页。